

政治信任心理机制的路径与融合

伍 麟 刘之钰*

〔摘 要〕 关于政治信任的心理机制,制度理论主要立足点是空间维度上的现实理性主义,认为个体会从理性计算的角度,在权衡、判断和评估政治组织与机构的业绩基础上形成政治信任的表现。制度在孕育政治信任方面的理性心理表现在便利获取信息的心理促进、经济收入平等的心理期待以及政治认同的心理感染等方面。文化理论主要立足点是时间维度上的早期经验主义,即在个体早期获得的依恋体验和人际信任。在个体层次上,早期经验当中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际体验都影响着后期政治信任的形成,并且在代际层面上政治信任具有家庭传承的特征。文化理论所反映的政治信任心理机制包括代际传承的心理依恋、学校教育的心理灌输以及知识积累的心理习惯。趋于融合的关系主义认识论取向则试图汲取文化理论和制度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将它们具体化结合,重点关注文化理论的早期经验基础性决定作用同制度理论的后期经验适应性调整作用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共同考虑历时态经验变化和相对稳定心理习惯的多层面功能,考察个体所处的家庭环境、经济资源、社会地位、人际关系、认知能力、情感体验是否以及如何直接或间接影响未来的政治信任。

〔关键词〕 政治信任;心理机制;制度理论;文化理论;关系主义

关于政治信任的心理机制,国内外学术界较为一致地认为存在制度理论和文化理论为主的两种取向。如Zmerli和Castillo(2015)概括了两种研究途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关注形成政治信任的制度作为;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关注社会资本和社会凝聚力的文化影响。张明新和刘伟(2014)认为考察政治信任的来源主要有基于制度或政府绩效的视角和基于社会资本(文化价值观)的视角。游宇和张光(2015)认为政治信任的解释表现为制度主义路径和文化主义路径。此外,许科(2013)等人、张书维(2014)等人也都认为制度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与文化理论是理解政治信任形成的基础。在学界已经积累了较多关于政治信任实证研究的情形下,非常有必要对具体的政治信任心理机制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思考和总结,以利于深化未来相关研究。

一、制度理论中的理性心理

制度理论主张政治信任属于一种认知现象,会随着个体社会环境和信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从制

*伍麟,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430092;刘之钰,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130118。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体系建设研究”(18VZL009)阶段性研究成果。

度意义上而言,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体对相关政治机构表现的判断影响着政治信任的水平。具体而言,在当今社会,制度孕育政治信任的理性心理集中体现在便利获取信息的心理促进、经济收入平等的心理期待以及政治认同的心理感染等方面。

（一）信息便利的心理促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互联网广泛普及和技术不断升级,深刻变革了人们的生活习惯、消费选择和交流模式。在线活动的新型方式和新颖体验使得人们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网络的交流互动。无论传统的媒体时代,还是现在的互联网信息时代,从各种信息源散发出来的信息构成同人的多元化关系,包括人们利用信息进行消遣和娱乐,使用信息完成知识学习和能力提升,通过信息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借助信息形成身份意识和社会认知,依赖信息进行社会监督和主张权益等。从报纸到广播,从电视到互联网,信息传播媒介的进步极大改变和丰富了社会的政治活动实践。相对于传统的信息媒介,互联网提供了物理条件的保障,使得个体能够迅捷地同信息源或活动方进行超时空的互动交流。这种变革性的意义是前所未有地激活了信息参与者的主体性。网络信息的互动特征不仅加深了信息时代各社会阶层获得和利用信息的大众化、平等化趋势,消解信息互动双方的距离障碍,而且深刻树立了信息时代全新范式的交流原则。虽然“信息鸿沟”客观存在,短时期难以完全消除,甚至会有加剧的可能,但是信息特权和封闭存在的状况无疑日渐式微。即使经济资源和社会地位弱势的社会成员也完全有可能低门槛、小成本地掌握应对外界、维持生计、改善境遇和主张救济的基本信息。并且,社会资源贫乏群体的声音也较以往更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起到广受注意的效果。网络信息的互动特征唤醒社会成员信息参与主体性的同时,也会创造他们便利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点燃和助推他们的热情和愿望,能够起到“由点到面”的扩散效应。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冲击下,社会各领域事务包括政治事务进程当中旧式的信息组织形式逐步丧失了垄断式的话语强权,深度沟通、透明意识、平等竞争、公正原则、民主参与等成为社会普通阶层的权利诉求。面对互动式信息交流的要求,政治事务进程需要秉持开放、乐观和担当的精神,自觉接纳信息利益代表的多样化、信息社会影响的广泛化、信息焦点转换的快速化、信息真实可信的误导化等实际挑战。

网络平台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信息源。尽管网络平台仍然存在信息失真、信息误导等偏差现象,但总体上由于网络信息更容易获得,信息互动更为及时简便,信息纠错机制更为灵敏,信息内容更加公开透明,信息责任更加容易监督和追踪,因而从实际效果上而言,依托网络平台更加容易培育个体层面上的社会资本,实现个体的社会参与。“社会媒体不仅是信息渠道,它们也可以有效地进行情绪和情感交流。社会媒体的使用有助于政治情感,进而影响民众的政治参与。”(Gan, Francis & Li, 2017, p.936)社交网站的互动性交往属性强烈,个体用户在判断信息安全和有必要的条件下,互动双方容易获得彼此的基本情况。传统媒体呈现信息的扩散空间有限,信息生产者的角色“垄断”色彩比较浓厚,潜含等级主义的中心取向。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政治议题的大众讨论、实践活动以及政策受惠结果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各种政治主体、党派力量以及社会媒体具备更充分民意理解的机会、更宽松意愿表达的空间以及更自由语言描述的弹性。网络信息时代的社会媒体给政治实践创造了新的契机。政治事务的决策通道在网络化媒体的时代变得更加开放、双向和高效。

（二）经济平等的心理期待

迄今为止,任何时期的任何人类社会都存在财富获取和占有上的个体差异,经济收入上的不平等始终是人类社会恒久存在的现象。“最广泛的讨论、最丰富的理论辩论,都集中在经济变革和社会现代化对降低政府信任的潜在影响方面。”(Russell, 2005, p.139)经济收入上的不平等容易挤压低收入

社会成员在其他领域的平等机会和权利。当平等机会和权利受到严重侵犯时,就很可能出现这些低收入社会成员的“社会边缘化”不利后果。以资源占有多少为区分标准,拥有资源多的一方同拥有资源少的一方天然形成社会存在的裂缝,并且这种裂缝不会自然愈合,反而在发展中有可能出现越来越大的趋势。如果某些群体和个体在较长时间内处于资源拥有匮乏的状态,那么他们持久弥漫的剥夺感心态势必撕裂和分化社会的整体团结,导致群际间的疏离和对抗,以及政治参与的失序、失衡甚至反常。如果社会控制不当,资源利益的博弈很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并且,即使社会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把社会冲突缓和起来,但利益博弈的社会冲突点燃效应始终长期存在,在某个特殊时点还可能集中爆发。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越严重,利益冲突和抗争的可能性越大,通过政治通道表达诉求和立场的愿望会越强烈。经济收入低、拥有资源少的群体和个体无论从社会权益的获得感、心理层面的自尊感,还是物质基础的安全感、精神状态的舒展感等多方面总体上都较为容易表现出脆弱性。在遭遇挫折和困难之后,他们自我恢复的信心不足、能力偏弱。对于不确定性事务的风险后果,他们往往无力承担,在风险的事先预防、事中规避和事后救济等方面也表现得较为盲目和无效。失落的社会情绪会加重对收入不平等的不满,经济差异的优先敏感会直接体现在政治议题的表达上。

由经济不平等引发的政治不信任氛围主导政治态度和政治认同的价值取向。“在国家层面上高水平的收入不平等与政治不信任有关。此外,个体对社会分配公平的看法与政治信任有着强烈的关联。因此,可以认为民主制度要对民众感受到的国家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程度负有责任。”(Zmerli & Castillo, 2015, p.190)现代社会崇尚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人与人的平等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社会信任是保障社会充满平等主义精神的重要因素之一,构成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全面平等的基础条件。从反面来说,如果社会信任沦落为广泛的社会不信任,其后果将为社会的进步带来巨大的代价。

(三) 政治认同的心理感染

政治信任是个体针对国家政治机构当中的行为人以及制度所表现出的期望一致性判断,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理性判断。“影响政府信任高低有两个最为直接因素:民众对于政府的认知,以及对于政府整体运作的公共期望(这种公共期望包括公共政策、公共服务,乃至制度系统本身)。”(赵泉民, 2013, p.14)公众对国家政治机构工作成效、公正、普惠等方面的评价是他们形成、表达和判断政治信任的基础。一方面,由于大众化信息传播的兴起和流行,公众获得政治信息的机会大增,成本锐减,内容丰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整体教育质量改善,社会参与水平提高,社会比较效应加强以及社会场合训练增多等综合作用的作用,显著促进了公众的信息素质,公众理解信息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大幅度提升。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认知动力为个体积累了信息资源,培育了参与技能。以备未来实际进行政治事务活动时能够摆脱鲁莽的随性而为,避免一时冲动,盲目逞能,进而做到能够审时度势,较好胜任复杂的政治事务。现代国家当中的政治机构数量众多、职能各异,公众呈现出来的政治信任水平千差万别,个体对于不同国家政治机构的工作评价所引发的政治信任程度却有着较为明显的关联性。个体往往从整体的角度,形成对于强大的、全局的国家政治机构的认识和评价。因此,对于不同国家政治机构的工作评价往往具有连锁效应,会彼此辐射渗透。个体和国家政治体系之间的重要连接机制就是政党。个体生命早期的政治社会化奠定了热爱政党的基础。从家庭环境、学校灌输、社会宣传等一系列过程塑造政党信仰,形成对于政党的深刻印象。政治成熟的个体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兴趣、认识、立场和信仰,容易形成稳定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具有强烈的显示作用,反映出个体的观念、评判和行为。他们对于政治问题有着自己恰当的看法,不会轻易随波逐流,也不会简单受到干扰信息的侵袭而改弦更张。“政治信任对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消除社会不公和个别特权现象的发生实现共同发展和成果共享,将对提

升公众政治参与满意度具有积极影响。”(郑建君, 2013, p.74)在已有政治认识、经验和时间的基础上,个体会判断自己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能力,形成专属的政治认同。

二、文化理论的经验心理

按照文化理论的观点,个体生活史的早期经验对于政治信任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个体早期所在家庭的主要抚养人、所在学校的环境氛围以及其他相关成长经历是决定成年后政治信任的关键。早期经验的生活元素能够稳定地延绵、渗入到个体成年以后的人生历程当中。这些生活经验塑造出人际信任,进而随着时间推进和生理成长,人际信任能够逐步拓展、派生出个体对于政治制度、机构、事务以及人物的政治信任。个体层次上,早期经验当中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际体验都影响着后期政治信任的形成,并且在代际层面上政治信任具有家庭传承的特征。

(一) 代际传承的心理依恋

政治事务虽然与个体的生活紧密相关,但又同个体的生活保持间距化的存在感,特别对于未成年人而言更为明显。由于年龄、阅历和能力的限制,未成年人往往不能系统了解与政治相关的事宜。在这种情况下,从小最熟悉的家庭中的主要照料人(通常为父母)就是个体长期且影响力巨大的政治观引领者,是个体发展形成政治信任的最直接榜样。“父母教育影响儿童成年后政治参与的三种方式是通过家庭政治讨论;提供教育、收入、公民技能和招募机会的社会经济过程以及其他途径的影响。”(Brady, Henry, Schlozman & Verba, 2015, p.163)个体青少年时期在家中观察到父母对政治事件的观点、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以及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情况,逐渐形成与父母相似的对待政治问题的理解,完成政治信任的代际传递,这个过程符合班杜拉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个体在青少年时期起,如果缺乏政治信任,那么成年之后容易表现出政治淡漠,回避政治事务,疏远政治活动,容易出现非常规的政治观或政治取向。在有着更好亲子关系的家庭中成长生活,从家庭获得更多安全感和亲情温暖的个体以及语言能力较强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政治信任。Gniewosz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在权威型家庭教养方式下成长的个体,由于长期受到严苛家教规则的约束,缺乏感受到来自父母的亲情温暖,容易日后表现出对政治议题缺乏兴趣,对政治事务淡漠疏离,对政治活动消极拒斥。上述现象从依恋理论的角度看,是由于个体自幼受到父母教养的影响,塑造出一些特殊心理表征,展现为对于诸多社会关系的期望偏差,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对抗权威型家庭教养的内部工作模式,并且这种对立权威型的内部工作模式具有可迁移性。当个体长大成人,步入社会之后,总要遇到各种不同社会距离和类型的社会权威。对立权威型的内部工作模式会把对抗父母权威的心理习惯迁移到对抗社会权威,包括政治领袖和政治人物。内部工作模式具有生成时间上的优势特征,个体自幼的依恋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依恋模式尤为重要,决定性影响了未来内部工作模式的运行样态。个体早期对于父母的依恋为日后对于权威的一般态度奠定了基础,并会在政治信任当中体现出来。

(二) 学校教育的心理灌输

个体从小长时接触的专业机构就是学校。“学校通常是青少年最早的场所,学习知道权威机构的制度运行如何进行,以及对这些权威机构能有什么样的期待。这些经验可以塑造后期对于公共领域其他机构包括政治当局的想法。来自不同国家的数据表明,青少年对学校的信任和积极认知同他们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有关。”(Šerek & Macek, 2014, p.285)公民教育体现国家意志,具有强制性。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把公民教育和政治科学教育纳入到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程体系,采取富有成效

的措施实现既定的目标。首先,从认识的角度学校教育传授青少年国家政治系统的知识,灌输国家的基本价值观,促进政治意识的发展,成为具有责任感的公民。从具体操作方面来看,学校一般最普遍采用的方式是通过开设政治科学、社会科学等课程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小学生进行公民教育,让他们学会公民应该遵守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了解国家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向中学生传授政治知识,通过普及道德、法律、政治、经济、哲学等课程内容增加必要的相关政治常识,使青少年全面发展政治信任。其次,学校教育让学生切身感受到学校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方式,提供机会鼓励学生经历民主互动的初步体验。学生在各种互动中学会为个人、为集体、为需要帮助的同学做出适当的民主决定,提前感受未来在社会中遇到相似情况的问题处理方法和情境。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下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而培养出面对、处理公共问题积极主动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教育与人的现代化不仅为社会转型提供人力、智力支撑,而且在“化民成俗”和“化俗成民”的过程中将作为社会根本的国民心理提升到更加适应物质水平、制度水平革新乃至引领社会生活变迁的高度,促进社会转型的‘内外兼修’。”(程天君,2014,p.68)最后,学校还可以通过为学生创造在社区中进行服务的机会,使他们在现实社会环境中体验基层政治机构的运作模式、并从官方和公民双方的角度观察同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法更适合已经具备一定政治知识和实践能力的青少年,它能快速直接地促进学生对政治内容的了解和关注,进而间接并有效地提升政治信任水平。而且,社区本身就是学生所熟悉的环境,社区里发生、存在和需要处理的问题也是学生成年后要真实面对的问题,提前实践社区业务不仅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政治信任程度,也有益于他们成年后生活的适应。民主、平等、开放的学校氛围有助于青少年学会与老师、同伴良好的沟通,并产生对机构的认同,进而把这种积极的态度投射到对政治人物和政府机构形成政治信任。Claes和Hooghe(2017)针对3025名比利时青少年,在16岁,18岁和21岁三个时间节点进行了一项为期5年的跟踪研究,考察各类公民教育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公民教育对于政治信任和政治兴趣起着重要影响,课堂教学、开放的课堂气氛、担任学校理事会成员同高水平的政治兴趣有着显著相关。通过发挥学校的作用来系统地培养未成年人积极的政治信念是极为有效的途径。总体上,在政治信任的培养方面,学校教育的心理灌输表现出层级推进的特征。

(三) 知识积累的心理习惯

作为一种以政治系统可信性为基础的观念,政治信任主要是根据人们以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来进行判断。形成政治信任的经验通常不是当前正在接收的,而是以过去积累的知识为基础的。由于政治是一个形式非常复杂、内容非常广泛的领域,因此需要个体通过接受更多的教育来积累大量的相关知识并进行相应的抽象推理才能实现政治信任。一定意义上,可以将个体政治信任的孕育过程及表现状态理解为特定态度的形成和呈现。高水平的认知能力和教育经历为个体准确、可靠的信息加工能力奠定基础,而准确、可靠的信息加工能力决定着个体态度的形成和呈现。公民通过受教育的过程,将外在的有关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的知识内化进个体脑中,经过认知能力的加工产生个人分析,获得参与政治的信心,进而形成政治信任。“绝大多数研究都显示,教育几乎是信任最重要的相关变量,教育水平更高的人比那些学历更低的人更容易产生信任。然而,对于如何解释这种强关系并没有达成共识。”(Hooghe, Marien & Vroome, 2012, p.604)一般来讲,受教育水平高的人具备更多的政治知识,理解和参与政治的能力更强,在看待政治事件和对待政治人物时通常能够从理性角度出发,更容易形成以理性角度为基础的政治信任;同时,受教育水平高的人往往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更优越,因此既能更好地享受政治带来的积极影响,也能更好地应对政治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也有助于形成政治信任。相反,受教育水平低的公民由于缺乏足够的政治知识和理解能力,在面对政治问题时更容易形成主观感性的评价,又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难以承受政治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不易产生政治信任。也就

是说,高学历的人对政治领域更高兴趣、更有意愿参与进政治活动中、更倾向于对政府机构和政治人物有信心。形成这种关系的内在机制可能是受教育更多的人对象征秩序和社会互动的文化规范有更好的理解;而且受教育更多人往往也更多地占据优势位置,使得他们在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更容易自我保护以及获得救济。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一系列过程的推理和解释都是建立在公民的早期受教育经历成果之上的,因此受教育水平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反映了文化理论的观点。当然,学术界关于教育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观点,教育水平与政治信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非一定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引起了政治信任提升的单向关系,也有可能是对政治系统持信任态度的人通常也更信任教育系统,因此他们在受教育过程中更容易获得成功,从而得到更高的学历。

三、趋于融合的关系主义

新近政治信任研究呈现出融合型认识论的取向,试图汲取文化理论和制度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将它们具体化结合,重点关注文化理论的早期经验基础性决定作用同制度理论的后期经验适应性调整作用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共同考虑历时态经验变化和相对稳定心理习惯的多层面功能,考察个体生理、心理成熟所处的家庭环境、经济资源、社会地位、人际关系、认知能力、情感体验是否以及如何直接或间接影响未来的政治信任。

(一) 认知能力的关系基础

大量的研究结果都验证了认知能力是影响政治信任的一个关键变量。2010年Schoon等人基于英国国家儿童发展研究数据库进行了一项纵向研究。该研究主要利用在1969年收集的16253名被试(都出生在1958年3月,测试时都11岁)一般认知能力测试数据,以及在1991年收集的上述同样被试中的15567被试(测试时都33岁)社会态度问卷数据进行跨时间的相关分析和建模分析。结果发现,个体11岁时的一般认知能力同33岁时的政治信任有着显著的关系,并且教育经历部分调节上述关系效应。童年时期认知能力得分高的个体、拥有较高学历的个体倾向于更加宽容和更加自由的社会观点。低社会阶层的个体表现出更少的政治信任,特别在男性中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个体早期的一般认知能力与成年后的政治信任呈现正相关。心理学家认为,推理过程影响社会态度,也就是智商促进社会态度的形成。智商越高的个体,认知能力越强。当面临思考、应对、选择或处理较为抽象的社会、道德、政治等领域的事务时,个体的认知能力会显示出优势特征,即认知能力越强的个体,越容易形成开放式思维和个性化态度,接触、获取和加工外界信息的数量也有可能更多。信息来源渠道更多元,更友好式信息互动的个体越发会显现出文化舒展型的社会态度取向,越能够接受新鲜事物,越主动体验新颖活动,更容易对“推陈出新”持赞同的态度。

认知能力与青少年后期的政治信任之间正相关可能是受早期环境的影响而来,个体在家庭、学校和社区中的成长经历塑造了他们在成年前的政治信任程度。“个体对社会中的他人、政府、体制等的态度更多是从生活中最亲近的人,大多是父母身上直接“移植”而来,父母所传递的态度、评价等作为基模为个人态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许科,赵国祥,孙娟,2013,p.572)一方面,认知能力强的青少年通常在学校里表现得更积极,通过更多地参与学校活动、熟悉学校规章制度,而这些习得的经验可以迁移到日后对待政治机构的态度方面;另一方面,认知能力强的青少年往往语言能力也强,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协助他们在家庭、学校和社区中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也可以迁移到日后对待政治任务和政治现象方面。由于政治事务所具有的复杂性、抽象性等的特点,客观上需要个体具备较强的语言能力去理解。

（二）社会地位的关系资源

2008年Deary等人基于1970版英国群组调查数据,考察童年时期家庭背景同成年后社会态度之间的关系。1970版英国群组调查是一项纵向调查,以出生在1970年4月5日至11日的17198名个体为调查对象。Deary等人选取全部个体中的8091名个体10岁时的智商数据,以及11070名个体30岁时的社会态度问卷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个体30岁时的社会阶层和教育学历同个体父母的社会阶层有显著相关。个体10岁时的智商同个体30岁时的社会阶层有显著相关。父母的社会阶层和政治信任以及个体社会阶层和政治信任都有显著相关,并且职业的专业化程度越高的个体,政治信任也越高。职业的专业化程度越高的个体,其政治信任程度也越高;或者是位高权重的高收入个体往往对政治具有更开明的观点和更高程度的信任。与占有丰富的社会经济、教育和动力方面资源的个体相比,个体缺乏优越资源会表现出低水平的信任。特别是那些长期缺乏好资源的个体会逐渐失去对政府机构的信心,而长期在有利条件下的个体往往对政府有很足的信心。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公民经济条件远没有那些社会等级高的公民好,社会地位差距造成的心理不平衡使经济条件差、得不到好工作、生活困难多的公民较少表现出对于民主政治系统高水平的信任。个体和群体的社会流动对于社会态度和社会参与起着重要作用。与自上而下的社会流动相比,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涉及更多付出奋斗的投入、价值观的更换、思维习惯的变化以及行为模式的改变。对于一个社会正常运行而言,有序上行社会流动的好处是能够满足人们本能及社会化的需求,保持社会活力,在规范社会现实多元化方面起到调节作用。合理的社会流动可以抑制社会阶层固化,消解社会惰性。社会阶层保持一定的流动,使得同一阶层内部的成员不至于过度同质化,而是较易呈现出阶层内部多样化的亚文化状态。

（三）认知参与的关系实现

政治是一个复杂的抽象领域,认知参与程度对于对政治信任构成明显影响。一些普通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不会觉得自己与政治有关系,他们可能不太了解政府机构组成,也不太关注时政新闻,甚至对于国家推行的新政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影响也认识不充分。这部分个体最容易受社会流行的政治不信任影响,惯性地认为政府官员都是腐败的,利民政策施行都是空口号,政府机构都是不作为的,但实际上他们连不同政府机构的具体职能都不了解,不知道它们各自拥有哪些权利,负责处理哪些事务或者能为公民提供哪些服务。有研究显示,在政治领域的认知参与跟政治信任呈现正相关。“缺乏对政治的认知参与或低水平的政治参与同低水平政治信任相联系,因为个体具有片面政治观念时,容易在负面方向上出现偏差。”(Šerek & Macek, 2014, p.285)反之,越习惯探索政治知识,越愿意思考政治问题,越能够理解政治现象的个体,越容易辩证地看待关于政治人物和政治机构的各项事宜,越利于产生政治信任。对政治有了足够的认知参与,面对一个政治事件或是某个政治现象时,人们才不会人云亦云地对政府或政治人物做出片面评价,而是理性、全面且透彻地评估该事件或现象导致的结果或形成的影响。当然,认知参与和政治信任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认知参与得越多就越容易促进政治信任的提升,反过来,高水平的政治信任也能激发出个体更多的认知参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认知参与和政治信任之间关系的理解需要考虑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

四、结语

从个体的发展需要角度看,在青少年各项身心发展任务当中,如何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国家公民,忠实履行特定社会角色义务,自觉担当相应的社会责任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方面之一。已有研究较多发现个体早期成长环境的家庭因素,特别是经济资源和社会地位同认知能力之间具有明显关联。从经

验主义的立场看,环境因素引发经验的事实势必伴随着机会主义的特征。家境殷实、物资充裕的家庭孩子比家境贫寒、物资匮乏的孩子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观察到更多的成功榜样的机会,置身于更多的人际交往网络的机会,上述机会优势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个体取得理想的知识积累、能力塑造和心理体验。根据文化理论,政治信任产生于个体早期生活经验之中,又由于认知能力特别是语言能力较强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政治信任,政治知识多、思考政治现象多的个体政治水平更高,社会地位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报告的政治信任更多,因此,通过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对他们加强语言能力的训练、培养对政治知识的兴趣、树立政治参与的意识、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来提升政治信任的水平对他们个人和社会都有重要意义。根据制度理论,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政治表现的评估,那么一方面,政府在经济领域可以通过调整国家或地方经济方针政策来改善整体经济环境,从客观上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加强地方基础建设、优化公民社会福利、增加个人基本收入;也可以通过改善经济分配方案使公民收入分配得更加公平,从主观上提升公民对个人财富价值的评估体验、缓解公民因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导致的心理失衡。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党在上述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直接从政治意见、政策推行和政见反馈等政治角度入手,让公民置身于积极的政治气氛中,自愿并主动地通过政党认同来表达诉求和实现诉求,进而达到提高政治信任程度的目的。文化理论和制度理论看似矛盾,其实也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即都认同信任是由学习而来,并受早期经验影响,不同之处在于文化理论不认为后期会发生变化,而制度理论强调后期知识和经验更新的影响。无论文化理论、制度理论还是终身学习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主义的理论起点,即个体身心发展是一种渐进的关系过程,主客体诸多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促使认知、情感、心理与态度的形成,政治信任由环境因素引发,且在生活史中不断演变和积累。

参考文献:

- 程天君, 2014:《从“社会转(zhuàn)型”到“社会转(zhuǎn)型”——教育与人的现代化引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第4期。
- 许科、赵国祥、孙娟, 2013:《风险社会中公众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及影响》,《心理学探新》第6期。
- 游宇、张光, 2015:《事与愿违:财政支出导向与政治信任》,《开放时代》第1期。
- 赵泉民, 2013:《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社会科学》第1期。
- 张明新、刘伟, 2014:《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公共管理学报》第1期。
- 张书维、许志国、徐岩, 2014:《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机制》,《心理科学进展》第4期。
- 郑建君, 2013:《政治信任、社会公正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一项基于625名中国被试的实证分析》,《政治学研究》第6期。
- Brady, H.E., K.L. Schlozman & S. Verba, 2015, “Political Mobility and Political Reproducti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657, pp.149—173.
- Claes, E. and M. Hooghe, 2017,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Science Education on Political Trust and Interest: Results from a 5-year Panel Stud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Education*, vol.13, pp.33—45.
- Deary, I. J., G. D. Batty and C.R. Gale, 2008, “Bright children become enlightened adul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19, pp.1—6.
- Gan, C., L. F. L. Francis and Y. Li, 2017, “Social media use, political affect, and participa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urban china”, *Telematics & Informatics*, vol.34, pp.936—947.
- Gniewosz, B., P. Noack and M. Buhl, 2009, “Political alienation in adolescence: associations with parental role

models, parenting styles, and classroom clim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vol.33, pp.337—346.

Hooghe, M., S. Marien and T. D. Vroome, 2012, “The cognitive basis of trust. the 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cognitive ability, and generalized and political trust”, *Intelligence*, vol.40, pp.604—613.

Russell, J. D., 2005,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trust in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15, pp.133—154.

Schoon, I. and H. Cheng, 2011,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Trust: A Lifetime Learning Mode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47, pp. 619—631.

Schoon, I., H. Cheng, C.R. Gale, G.D. Batty and I.J. Deary, 2010, “Social status, cognitive ability,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s predictors of liberal soci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trust”, *Intelligence*, vol.38, pp.144—150.

Šerek, J. and P. Macek, 2014, “Antecedents of political trust in adolescence: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perceptions of parents”,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35, pp.284—293.

Zmerli, S. and J.C. Castillo, 2015, “Income inequality, distributive fairness and political trust in Latin Americ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52, pp.179—192.

(责任编辑:蒋永华)

The Approaches and Integr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Political Trust

WU Lin, LIU Zhi-yu

Absrtact: Politics is a key factor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socialization,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an individual’s life history. With regard to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political trust, the main foothold of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is the realistic rationalism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and it believes that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 forms the performance of political trust on the basis of weighing, judging and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from the angle of rational calculation. The rational psychology involved in the institutional generation of political trust is manifested in the psychological promotion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the expectation of economic income equality and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 of political identity. While the main foothold of cultural theory is the early empiricism in the time dimension, i.e. the attachment experience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acquired by individuals in the early stage. The value, life attitude and inter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early experienc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ll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later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political trus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inheritance at the intergenerational level.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political trust reflected by the cultural theory includes the psychological attachment of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the psychological indoctrina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psychological habits of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dditionally, the epistemological orientation of relativism tries to draw on the basic viewpoints of cultural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combine them concretely. It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sic decision role of the early experience identified by the cultural theory and the adaptive adjustment of the later experience identified by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thereby dealing with the multifaceted functions of the changes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time and the relative stability of the psychological habits, and examining whether and how the family environment, economic resources, social stat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gnitive ability,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influence the future political trust.

Key words: political trust;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institutional theory; cultural theory; relativism